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分期与相关问题

段天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要： 本文将辽东丘陵北部地区的以马城子诸洞穴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成了三期。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揭示出，在岳石文化影响的背景下，该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与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和上马石瓮棺葬遗存有着交流和互动的史实。并指出，在岳石文化之后，辽东丘陵地区可能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从而成为了左近地区后来出现的石构墓葬遗存的重要文化背景。

关键词： 辽东丘陵北部地区；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岳石文化；上马石瓮棺葬遗存；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以千山山脉为主干的辽东丘陵地区，南面濒海，东北部与长白山脉毗连。以辽河口和鸭绿江口一线为界，可将该地区分为南部面向海洋的辽东半岛丘陵地区和北部面向大陆的辽东丘陵北部地区。辽东半岛丘陵地区拱卫渤海，与胶东半岛呈犄角之势；北部丘陵地区则是沿海地区连接内陆的重要缓冲地带。

笔者曾就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遗存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1]。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辽东丘陵北部地区，考察该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及文化交流等问题。

一、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分期与编年

1979 年，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在辽宁本溪山城子庙后山 B、C 洞发现了一类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这类遗存“在埋葬风俗、生活器皿和生产用具上均具自身特点”并将其命名为“庙后山文化类型”[2]。李恭笃先生指出，在本溪北甸近边寺 2 号洞，发现有这类遗存叠压于“以新石器时代的直筒罐为主的文化遗存”之上的层位关系，并进一步归纳了庙后山文化的基本特征[3]，继而将分布于太子河上游以马城子 B 洞下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称为“马城子文化类型”，将以山城子 B 洞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称为“庙后山文化类型”[4]。随着本溪地区马城子 A、B、C 洞、张家堡 A 洞、山城子 B、C 洞、北甸 A 洞等洞穴墓葬遗址的发掘[5]，该类遗存的发现日渐丰富。《马城子》报告将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马城子文化”，并认为“马城子文化”分布于辽东山区，与同时期辽河平原上的顺山屯文化属“由同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发展延续而来的，分布于不同地区的两个分支”[6]。赵宾福先生认为“新乐上层文化”、“老虎冲类型”、“顺山屯类型”、“望花类型”、“庙后山文化”等应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并用统称之为“马城子文化”[7]。

鉴于学界对此类遗存的内涵、性质等问题，尚存在不同意见。这里，我们暂将以《马城子》报告发表的早期青铜时代各洞穴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统称为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

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分期问题是讨论辽东丘陵地区文化交流的基础，也是解决周边地区相关文化遗存的年代与源流等问题的关键。

在该类遗存中，张家堡 A 洞、山城子 B、C 洞墓葬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器，发现了具

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为我们解决这类遗存的分期问题提供了条件。

该类遗存的陶器器类比较简单，主要有壶、罐、钵、碗、杯、盆等。以壶数量最多。例如，张家堡 A 洞墓地共出土陶器 309 件，其中壶 157 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 50.8%。同时，陶壶的种类较多、形态多样。因此，陶壶可以作为分期的指征性器物。

观察马城子诸洞穴遗存出土陶壶的形态，可以发现，《马城子》报告按照陶壶的颈部形态将其分成了斜颈、直颈、鼓颈、短颈等类，一同并列的还有竖耳、横耳以及卷沿类陶壶（表一）。其中，斜颈和直颈类壶均有腹部无耳和有耳两种形态，同时因耳的做法不同还有竖、横桥状耳及竖、横盲耳、三角形盲耳等形制；而竖或横耳类壶的颈部特征既有直颈，又有斜颈，耳部特征也是既有桥状耳又有盲耳。该类遗存陶壶的颈部形态与耳部特征存在大量重合于同一类壶上的情况。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有耳壶系斜颈或直颈无耳壶直接加上耳制成，无耳斜、直颈壶与有耳斜、直颈壶除无耳外，整体特征并不具有本质的差别。另外，短颈壶的颈部近直，卷沿壶的敞口、沿部斜直的特征，若降低斜颈壶颈部的高度便可制成。

因此，我们在观察陶壶的形态时，可依据颈部特征把陶壶分为斜颈、直颈、鼓颈三类。由于鼓颈壶发现的数量不多，从早至晚在形态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暂不做讨论。

表一：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出土陶壶的器类一览表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2">器类
地点</th><th colspan="3">直颈壶</th><th colspan="3">斜颈壶</th><th>鼓颈壶</th><th>短颈壶</th><th rowspan="2">器　类</th></tr>
<tr><th>无耳</th><th colspan="2">有耳</th><th>无耳</th><th colspan="2">有耳</th><th>无耳</th><th>无耳短直颈</th></tr>
<tr><td rowspan="6">马城子</td><td rowspan="2">A 洞</td><td>8</td><td colspan="2">0</td><td>22</td><td colspan="2">0</td><td>0</td><td>0</td><td></td></tr>
<tr><td></td><td colspan="2">1 桥状</td><td></td><td colspan="2">0</td><td></td><td></td><td>竖耳壶</td></tr>
<tr><td>B 洞</td><td>12</td><td colspan="2">0</td><td>0</td><td colspan="2">0</td><td>0</td><td>2</td><td></td></tr>
<tr><td rowspan="2">C 洞</td><td>12</td><td colspan="2">0</td><td>22</td><td colspan="2">竖方盲耳 4</td><td>0</td><td>0</td><td></td></tr>
<tr><td></td><td colspan="2">0</td><td></td><td colspan="2">桥状 1</td><td></td><td></td><td>竖耳壶</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3">张家堡
A 洞</td><td>9</td><td colspan="2">桥状盲耳 1</td><td>93</td><td colspan="2">竖桥状耳 8</td><td>3</td><td>卷沿壶 1</td><td></td></tr>
<tr><td></td><td colspan="2">0</td><td></td><td colspan="2">竖盲耳 11</td><td></td><td></td><td>竖耳壶</td></tr>
<tr><td></td><td colspan="2">桥状盲耳 4</td><td></td><td colspan="2">桥状盲耳 12 桥状横耳 15</td><td></td><td></td><td>横耳壶</td></tr>
<tr><td rowspan="3">山城子</td><td rowspan="2">B 洞</td><td>3</td><td>乳丁 1</td><td>堆纹 3</td><td>51</td><td>桥横盲耳 6</td><td>桥状竖耳 2</td><td>0</td><td>0</td><td></td></tr>
<tr><td></td><td colspan="2">盲耳 1</td><td></td><td>0</td><td>0</td><td></td><td></td><td>竖耳壶</td></tr>
<tr><td>C 洞</td><td>0</td><td colspan="2">0</td><td>7</td><td>三角盲耳 3</td><td>桥状竖耳 2</td><td>2</td><td>0</td><td></td></tr>
</table>

注：数字表示件数。

下面，我们先来看斜颈壶。

张家堡 A 洞发现有 52 座墓葬，分布于第 2、3、4 层。

第 2 层，有 M1—10、15—18、26、39、42、48 等 18 座墓葬。

第 3 层，有 M11—14、19—25、27—36 等 21 座墓葬。

第 4 层，有 M37、38、40、41、43—47、49—52 等 13 座墓葬。

另外，张家堡 A 洞墓地还发现了五组墓葬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其中四组属于第 2 层墓葬叠压第 3 层墓葬（M2→M11，M4→M12，M5→M13，M7→M19），一组属于第 3 层墓葬间的打破关系（M11→M20）。

将张家堡 A 洞墓葬出土的各类陶壶和陶罐的型式及其底部特征按照层位进行排比（表二），便可发现，张家堡 A 洞第 4 层墓葬出土的斜颈壶有小平底和假圈足两类。第 2、3 层墓葬出土的斜颈壶中始见圈足。另从第 4 层 M50：3 假圈足壶（图一，8）的出现较第 3 层 M36：3、1 圈足壶（图一，1、2）早等现象均可看到，假圈足壶的出现早于圈足壶。同样地，出土于不同层位的竖耳壶、横耳斜颈壶以及叠唇罐、横耳罐等的底部特征均存在这一现象。这说明，圈足特征的出现晚于假圈足。从这一规律出发，在逻辑上可以认定仅出土于第 4 层的小平底壶如 M46：5（图一，13）的出现应较假圈足壶更早。这样，我们就初步总结出了斜颈壶底部从早到晚的形态演变特征，即壶底部由小平底到假圈足再到圈足。

表二：张家堡 A 洞墓葬陶壶的底部特征一览表

层位	斜颈（无耳）壶	竖耳（斜颈）壶	横耳（斜颈）壶	直颈壶	鼓颈壶
2	圈足、假圈足、平底	圈足、假圈足	平底、圈足、假圈足	假圈足	假圈足
3	圈足、假圈足	假圈足	平底、圈足、假圈足	假圈足	假圈足
4	小平底、假圈足	假圈足	假圈足	假圈足	

我们还发现，张家堡 A 洞第 2 至 4 层墓葬均出土 VII6 式斜颈壶。而原报告发表了三件该式斜颈壶标本，其中第 4 层的 M46：5 为小平底、第 3 层的 M20：7 和第 2 层的 M10：3 底部呈假圈足。这一方面再次证明了上文总结出来的规律，更提示我们，斜颈壶的发展演变存在着更加复杂的轨迹。

表三：张家堡 A 洞墓葬斜颈壶的分组表

组	层位	斜颈（无耳）壶[8]	竖耳（斜颈）壶	横耳（斜颈）壶	底部特征组合	单位
三	**2**	VI2、VII3、VII4、VII5、VII6、VIII1、VIII2、VIII3、VIII4、VIII5、VIII6、III5	III、II2	I3、III1、III2、IV、V	圈足 假圈足 小平底	M2、3、5~13、15、16、18、26、39、42
	3	II2、II3、III3、III4、III5、II1、斜 IX1、斜 IV、V1、V2、VI1、VII1、VII2、IX2、斜 IX3、VII6	斜 IX4	I2、I3、I4、II1、II2、III2、IV		M11、17、20、21、25、29~36
二	**3**	II2、II3、VII1、	斜 IX1	I4	假圈足 小平底	M22、24、27、28
	4	I、II1、III2、VIII5				M37、38、41、43、44
一	**4**	III1、VII6	I	I1	小平底	M45、46、50、52

更有趣的是，查《马城子》报告附表四—4《张家堡 A 洞墓葬登记表》可以发现，第 4 层的部分墓葬仅出土小平底斜颈壶，例如，III1 式斜颈壶如 M45：1 与 VII6 式斜颈壶如 M46：

5 在 M45 中共出，二者均为小平底。而第 4、3 层中亦存在部分小平底斜颈壶与假圈足斜颈壶共出的墓葬，第 3、2 层中亦有部分的圈足斜颈壶与假圈足或小平底斜颈壶共出的墓葬。由此，我们将具有三种斜颈壶组合方式的墓葬分成早晚相继的三组，并将这些墓葬和其中出土斜颈壶的型式列成表三。

表三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斜颈壶的小平底特征最早出现，此后出现的假圈足特征一直沿用到了使用圈足的时期，而平底的特征在圈足时期亦有发现，因此，斜颈壶小平底、假圈足和圈足特征的演变属于新不代陈、新旧共存式的发展。

斜颈无耳壶从早到晚的形态和组合演变特征同样也适用于斜颈有耳壶。例如，张家堡 A 洞 I 型竖耳壶、I1 式横耳壶为平底，这两类壶存在于仅有小平底斜颈壶的第一组中，而第三组中的竖耳和横耳斜颈壶则出现了假圈足和圈足共生的特征（表三）。这也再次说明斜颈有耳壶具有与斜颈无耳壶具有相同的演化规律。

我们根据上文得出的结论，将张家堡 A 洞墓葬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形式亦排列出来，去掉不具有分期意义的器物列成表四。我们还可以看到，第 4 层 M49 出 I1、I3 式陶碗，可将其归入第一组，M47 出 II1 式叠唇罐，其年代当属第二组，M51 既出土第一组的 III1 式斜颈壶又出土第二组的 II1 式斜颈壶，该墓的年代属于第一、二组之间或第二组。第 3 层 M14 出 II2、III2 式横耳罐、第 2 层 M4 出土 IV5、V2、VI2 式横耳罐等器物，均属于第三组。第 3 层的 M19 既出二组的 I3 式叠唇罐又出三组的 II2 式横耳壶、II2 式横耳罐，它们的年代介于第二、三组之间或属于第三组。

另外，M1、M12、M13、M23、M40、M48 不出陶器。但 M1、48 属第 2 层可归入第 3 组，第 3 层的 M12、13、23 年代应不早于第 2 组，第 4 层 M40 的年代应属第一或二组。

表四：张家堡 A 洞墓葬其他器物分组表

组	直颈壶	鼓颈壶	罐				钵				碗	杯
			直领	横耳	叠唇	敛口	叠唇	横耳	敛口	鋬耳		
三	II1 II3 III1 III2 III3 III4	I1 I2 II	IV V	II2 II3 III1、III2 III3 III4 III5 IV1 IV2 IV3 IV4 IV5 IV6 IV V1 V2 V3 VI1 VI2 VI3	I2 I4 II2 II3 III1 III2 III3 III4 III5 IV1 IV2 IV4 IV5 V	III IV1	II III1 III2 IV1 IV2 V VI1 VI2	I1 I2 II1 II2 III2 III3 IV V2	II	II III IV	I4 II4 III IV1 IV2 V1	I2 III IV VI1 VI2
二	I2 II2			I2 III1	I3 II1 III2	I II III	II III1 IV1 IV2 IV3	I2	I		II2	II1 V1 V2
一	I1		II	I2 II1	I1 III1	I	I		I		I1I2II3	

山城子 C 洞发现有 12 座墓葬，分布于第 2、3、4 层。其中，不出陶器的墓葬有 M3、4、6、8 四座，出土陶壶的墓葬有 M1、2、5、、7、10、11、12 等七座。

山城子 C 洞 4 层的 M7：4 斜颈壶底部为凹底（图二，13）。《马城子》报告附表四—6《山城子 C 洞墓葬登记表》显示，在 M7 中，M7：4II2 式壶与 M5：4IV1 式假圈足壶（图二，7）共生。同样的情况，在该洞第 2 层的墓葬中也有出现（表五）。从上文可知，假圈足壶出现于张家堡 A 洞二组时期，从该洞墓葬仅出土斜颈假圈足壶不见圈足壶的组合特征可判断，山城子 C 洞第 2 至 4 层墓葬的年代大致属于相当张家堡 A 洞二组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城子 C 洞 M5：2（图二，8）与 M1：8（图二，3）相似，二者皆为 III 型假圈足壶，M7：5I 型斜颈壶腹部呈枣核状的形态与张家堡 A 洞 IX1 式斜颈壶相似，而张家堡 A 洞 IX1 式斜颈壶与假圈足壶共生的现象出现于张家堡二组时期。这些现象再次证明，山城子 C 洞的出土陶壶的七座墓葬年代当与张家堡 A 洞二组相当。第 2 层的 M9 虽然不出陶壶，但与 M1 同出 III 型陶杯，故二者年代大致相当。

山城子 C 洞凹底斜颈壶的发现暗示出，在斜颈壶由假圈足向圈足的演变过程中，圈足的产生很可能是假圈足的制法受到了凹底壶工艺的启发所致。

表五：山城子 C 洞墓葬陶壶的底部特征一览表

层位	斜颈壶		鼓颈壶		单位
2	II1、III、IV2	凹底、假圈足	M2：2 等 2 件	假圈足	M1、2、10
3	III、IV1、IV2	假圈足			M5、11
4	I、II1、II2、IV1	凹底、假圈足			M6、7、12

直颈壶呈现出来的演变规律似乎不很明显。在表二可以看到，张家堡 A 洞墓葬第 2、3、4 层墓葬中出土的直颈壶底部皆为假圈足，没有发现圈足或平底的特征。

山城子 B 洞发现了 T2②：22 类圈足直颈壶和 M5：9 类平底直颈壶（图三，1、11）。《马城子》报告图一七五发表了山城子 B 洞部分墓葬的层位关系：M4、M5、M9、M10、M11→②→③，并指出，该洞的 11 座墓葬均分布在第 2 层内。可以看到：T2③：20 假圈足直颈壶（图三，6）早于 T2②：22 圈足直颈壶（图三，1），似乎在直颈壶中亦存在着底部由假圈足演变为圈足的规律。

然而，在层位上晚于 T2②：22 类圈足壶的 M5、M11 皆出土 M5：9 类小平底直颈壶。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否说明直颈壶的演变存在着一条不同于斜颈壶的轨迹，亦即，假圈足演变为圈足再变为小平底呢？

我们仔细审视该洞部分墓葬还能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M4~7、M9、M11 为二次捡骨葬，即为迁葬。因此，这几座墓葬所处的应不是其原生层位，他们与第②、③层的相对早晚关系存在多种可能。鉴于山城子 B 洞的直颈壶亦发现了由假圈足发展为圈足的情况，我们依此规律将 M5：9 类小平底直颈壶出现的年代排在 T2③：20 类假圈足壶之前。

这样，我们可以推知，直颈壶亦存在由小平底向圈足演化的现象，也走了一条与斜颈壶同样的发展道路。

表六：山城子 B 洞出土的斜颈壶和直颈壶的底部特征表

组	墓葬	斜颈壶		直颈壶		竖耳壶		备注	同时期单位
	M4	IV、VII	假圈足、圈足					迁葬	

三	**M7**	VII	圈足					迁葬	T2②
	M8	II、VI	假圈足、圈足						
	M1	III	假圈足						
	M3					1	假圈足		
	M2			III1	假圈足				
	M10			II2	假圈足				
二	**M9**	I、V	假圈足、平底					迁葬	T2③
一	**M5 M11**			I	平底			迁葬	

按照该洞墓葬出土斜颈壶和斜颈壶的底部特征并结合层位关系，我们将山城子 B 洞的墓葬分为三组。其中，M9：4 与张家堡 A 洞二组 M2：11 斜颈壶（图四，27）相似，M8：5、M4：7[9]分别与张家堡 A 洞三组 M20：21、M36：3 斜颈壶（图四，7、24）相似，说明其年代相当。

我们以张家堡 A 洞出土的斜颈无耳壶及该洞和山城子 B、C 洞出土的部分斜颈有耳壶和直颈壶的形态为例，将斜颈壶和直颈壶的演变轨迹列成图四，并以此为标准将这三个洞穴的墓葬分为三组。

第一组　包括张家堡 A 洞第一组[10]和山城子 B 洞第一组；

第二组　包括张家堡 A 洞和山城子 B 洞第二组、山城子 C 洞诸墓葬；

第三组　包括张家堡 A 洞及山城子 B 洞第三组。

《马城子》报告发表的马城子 A、B、C 北甸 A 洞等四个洞穴墓葬址没有发现层位关系。另外，新宾老城石棺墓[11]、东升洞穴、牛心山洞[12]、本溪三道河屯虎沟、程家村[13]、谢家崴子[14]、桓仁大梨树沟[15]等遗址亦发现了同类文化遗存。我们根据上文得出的斜颈壶和直颈壶的演变规律将此类遗存分为三期（表七）。并将具有分期意义的陶壶、罐、碗、钵、杯等器物列成图五。

正如《马城子》报告指出，马城子诸洞穴墓葬基本上是成排埋葬的。对照以上分期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马城子各洞穴墓葬的从早到晚的排列存在一定顺序。例如，张家堡 A 洞 5 第四层墓葬可分三排，为自每排的中心向两边排列。第三层墓葬分洞口、洞里两个墓区。洞口区墓葬可分为四排，基本上呈自南向北排列。洞里区的墓葬为自洞口向洞里埋葬。山城子 B 洞的 10 座墓葬中有 4 座系迁葬，其埋葬顺序不明确。马城子 A 洞墓葬系自中间向洞口和洞里排列。马城子 B 洞靠近洞中部和洞内的墓葬较早而近洞口的墓葬较晚，系自洞内向洞外排列。马城子 C 洞墓葬居于中心的 M21、5 及靠近洞口的 M3、4 较早，故该洞墓葬的排列总体上为自洞口向洞里排列，在各排上来讲为自中心向两边排列。可见，马城子不同洞穴墓葬的排列顺序虽然存在部分差异，但这些洞穴内墓葬的埋葬顺序显然都经过了事先的规划。

表七：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分期表

期	张 A、山	马城子	马城子	马城子	北甸	老城	东升	虎沟	程家	谢家	大梨

	B、C 洞	A 洞	B 洞	C 洞	A 洞				村	崴子	树沟
晚	三组	M5、7、12、18、27	M9、10	M2、7、11					√		√
中	二组	M1~4、8、10、11、14、19~22、23~26、28、29	M1~5、7、8、11、13、14	M1、6、9、10、13~18、20、22	M2	M2、4	√	√		√	√
早	一组	M13、17		M3~5、21		M1、3					
备注		马 A 洞 M15、马 C 洞 M8、23 的年代介于早、中期间或属于中期， 马 A 洞 M9 的年代介于中、晚期间或属于晚期。									

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共有八个碳十四数据（表八）。从中可知，该类遗存第一期的两个数据的年代大约在 1900—1600B.C.之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时期。第三期五个数据的年代皆在 1400—1100B.C.之间，大致相当于中、晚商时期。第二期仅有的一个数据年代偏晚，进入了第三期的年代范围内。由于第二期的年代应介于第一、三期之间，我们根据绝大多数的碳素年代判断，第二期年代应为 1600—1400B.C.，相当于早商时期。

表八：《马城子》报告部分墓葬碳十四数据一览表

期	单位	标本号	材料	公元前	树轮校正（B.C.）
晚	张家堡 A 洞 M7	ZK—2164	木炭	1030±55	1185±95
	张家堡 A 洞 M4	ZK—2163	木炭	1115±60	1290±140
	张家堡 A 洞 M11	ZK—2165	木炭	1140±55	1320±135
	张家堡 A 洞 M14	ZK—2166	木炭	1165±60	1405±140
	山城子 B 洞 M7	PV—265	人骨	1310±80	
中	马城子 A 洞 M7	WB84—23	木炭	1025±70	1230±145
早	山城子 B 洞 M5	PV—266	人骨	1610±80	
	张家堡 A 洞 M52	ZK—2167	木炭	1635±65	1935±90

二、岳石文化与辽东丘陵地区南、北部的文化交流

《胶东辽东》一文就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进行过简要的梳理，指出双砣子二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属于岳石文化。要之，辽东丘陵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否也存在着与岳石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呢？

笔者曾揭示出，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遗存与长海县上马石瓮罐葬遗存[16]间存在交流的现象。我们还可以发现，上马石瓮棺葬中被《胶东辽东》归入 B 组中的部分陶器，具有一定的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特征，例如，张家堡 A 洞 M45：1、M38：1 壶（图六，1、4）与上马石瓮 M13：1、瓮 M16：1（图六，9、10）相类。这一现象暗示着。辽东半岛南部上马石瓮棺葬遗存与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间亦在存在着交流。

看来，上马石瓮棺葬体现出三类文化因素：一类具有本地文化传统的器物，以瓮 M9：1、瓮 M1：1、瓮 M11：1 为代表（图六，11—13），一类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影响，以瓮 M14、瓮 M12：1、瓮 M16：1、瓮 M17：1、瓮 M17：2（图六，14—18）为代表，一类受到了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影响（图六，9、10）。

可见，辽东地区北部与南部间存在着文化交流。

下面，我们再回到辽东丘陵地区北部。

在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早、中期遗存里，可以看到岳石文化的影响，例如，山城子 B 洞 M11：1 、M11：6 杯、马城子 B 洞 M13：8 罐、（图六，2、3、5）与岳石文化同类器物牟平照格庄 H11：67、T10③：9、泗水尹家城 T267⑦：41、T289⑦：16 相似（图六，19—22）；还有，张家堡 A 洞 M41：4、M47：4 罐（图六，7、8）分别与烟台芝水 T6⑪：16、照格庄 H9：20、尹家城 T152⑦：31 相似（图六，23—25）。

然而，岳石文化的脚步并未停留，而是由辽东地区继续北进，正如笔者在《胶东辽东》一文中所指出，在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中亦发现了岳石文化因素[17]。

可见，在上文勾勒出的历史图景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辽东丘陵北部地区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影响，更可以看到辽东地区北部的马城子洞穴墓葬遗存对南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产生了一定影响。实质上，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的影响也渗透到了辽东丘陵地区，并通过此地传播到了胶东半岛上。

三、辽东丘陵地区在岳石文化之后的文化发展

当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及其同时的瓮棺葬消失后，羊头洼类型出现了。

陈光先生曾指出，羊头洼类型与上马石瓮棺葬遗存相比“整个器物群的作风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器底由假圈足全变成圈足和凹底；弦纹变成划纹和刺点纹饰；圈足罐形制多样富于变化[18]。” 笔者在《胶东辽东》一文中提出，羊头洼类型的来源可能不仅仅是辽东半岛上的岳石文化和上马石瓮棺葬遗存两个，并指出羊头洼类型的带刻划和刺点纹的圈足罐的做法可能继承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后洼下层文化和稍晚的蚊子山遗址同类陶壶的作风。

辽东丘陵地区北部的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的陶壶等器物自晚期开始不见了岳石文化因素，说明该类遗存晚期开始的时间与羊头洼类型大体一致。与此同时，该类遗存中圈足的做法也开始盛行起来。这一现象与辽东半岛上发生的情景惊人地相似。

不同的是，辽东半岛在岳石文化存在时和消失后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辽东丘陵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却未中断，一脉相承地发展了下来。至于两地陶器圈足出现的原因是否一致，目前仍无法定论，但圈足作为辽东地区岳石文化之后出现的时代特征，颇耐人寻味。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岳石文化对辽东半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羊头洼类型的产生奏响了序曲，而辽东丘陵北部地区的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虽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影响，但仍旧走着自己的道路，并在岳石文化时期就与辽东半岛地区产生了交流。岳石文化之后，二地区虽出现了共同的时代特征，但他们的文化性质不同，走着各自的发展道路。辽东半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正如孙守道、郭大顺先生业已指出，表现出沿黄渤海和鸭绿江流域的发展趋向[19]。而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则很可能成为长白山地部分石构墓葬遗存的源头。

（该成果得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6BS34）、‘985 工程’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 段天璟.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岳石的文化的相关问题[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以下简称《胶东辽东》.

[2] 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本溪县文化馆. 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85(6): 485¯496.

[3] 李恭笃. 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J]. 考古, 1985(6): 551.

[4] 李恭笃. 本溪地区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J]. 辽海文物学刊, 1989(1).

[5] a.齐俊. 本溪地区太子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J]. 北方文物, 1987(3).

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 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以下简称《马城子》报告.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 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294.

[7]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137.

[8]《马城子》报告中, 张家堡A洞出土的斜颈壶除IX型为竖耳外皆无耳, 故本文将原报告的IX型斜颈壶归为竖耳(斜颈)壶, 简称"斜IX"型。

[9] 山城子B洞M9: 4、M8: 5、M4: 7见《马城子》报告第239页图九一二, 2、第241页一九三1、3。

[10] 根据上文得出的规律, 张家堡A洞M45中平底斜颈壶(M45: 1)与假圈足直颈壶(M45: 7)共生, 故其年代当介于张家堡A洞一、二组之间或属第二组。

[11] 李继群、王维臣、赵维和. 新宾老城石棺墓发掘报告[J]. 辽海文物学刊. 1993.

[12] 抚顺市博物馆、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东升洞穴古文化遗存发掘整理报告[J]. 北方文物, 2002(1).

[13] 魏海波. 本溪连山关和下马塘发现的两座石棺墓[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2).

[14] 齐俊、刘兴林. 本溪水洞遗址及附近的遗迹和遗物[J]. 辽海文物学刊, 1988(1).

[15] 梁志龙. 桓仁大梨树沟青铜时代墓葬调查[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2).

[16] 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长海县上马石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 1982(6): 591¯596.

[17] 段天璟.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岳石的文化的相关问题[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140.

[18] 陈光. 羊头洼类型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32.

[19] 孙守道、郭大顺. 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四).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10.

The Period of Machengzi Caves Relics and Some Relevant Problems

Duan Tian-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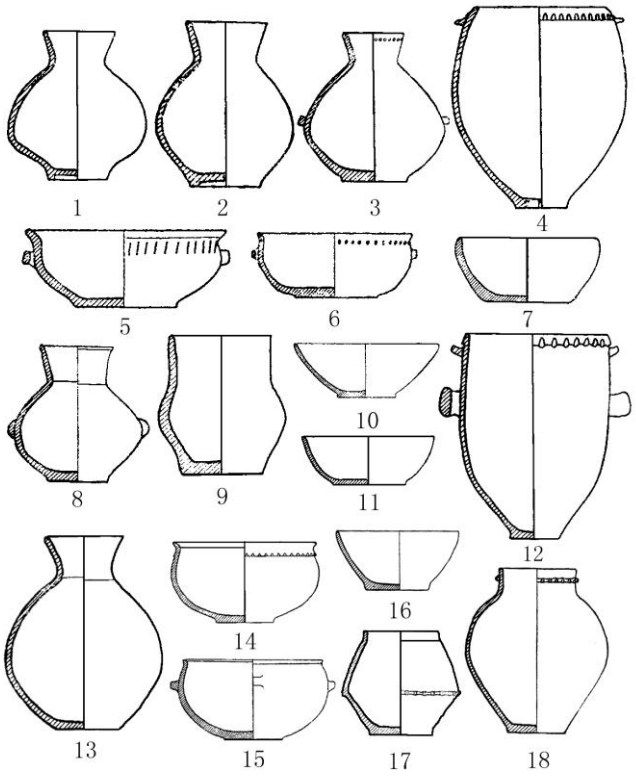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d the machengzi caves relics into three periods. Based the prece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it revealed that this part of relics were related to the yueshi culture and other relics in jiadong peninsula. This paper determined that there were some common time features in the jiaodong hills before the yueshi culture,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cultural background for producing stone tombs.

Key words: North part of The Liaodong Hills; Machengzi Caves Relics; Yueshi Culture; Shangmashiwengguan Tombs

收稿日期: 2008-0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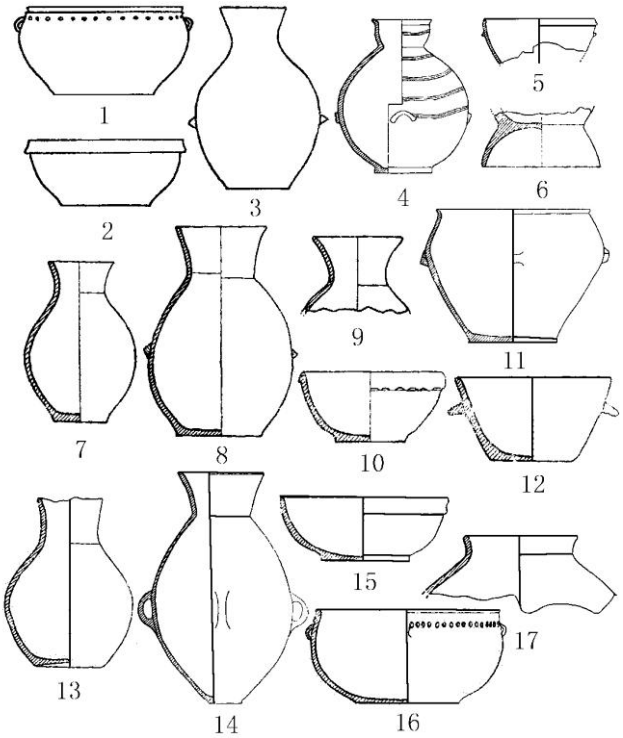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6BS34）

作者简介: 段天璟（1977-），汉族，山西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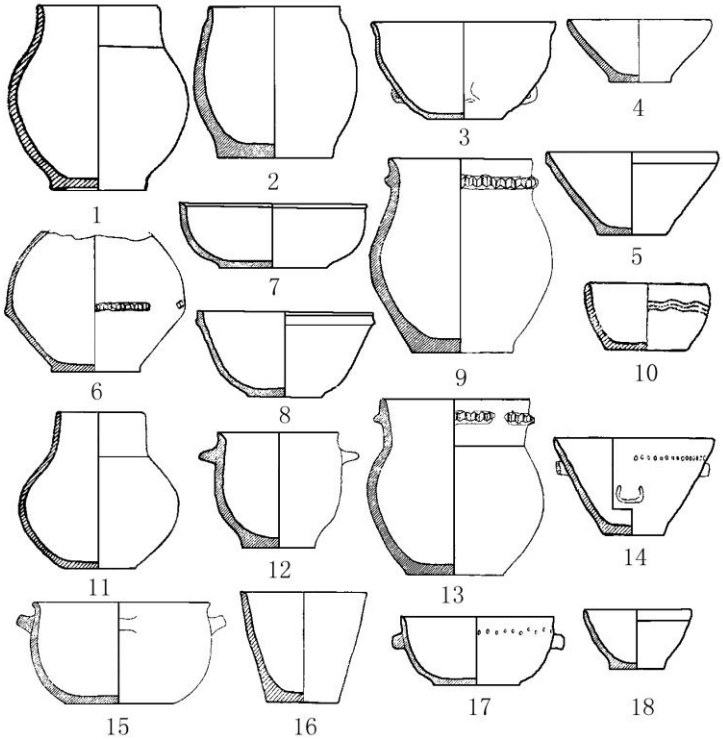
图一
张家堡 A 洞墓葬
出土陶器

1. M36：3　　2. M36：1
3. M36：9　　4. M36：17
5. M36：5　　6. M36：6
7. M36：7　　8. M50：3
9. M50：7　　10. M50：6
11. M50：2　　12. M50：1
13. M46：5　　14. M46：4
15. M46：2　　16. M47：1
17. M47：3　　18. M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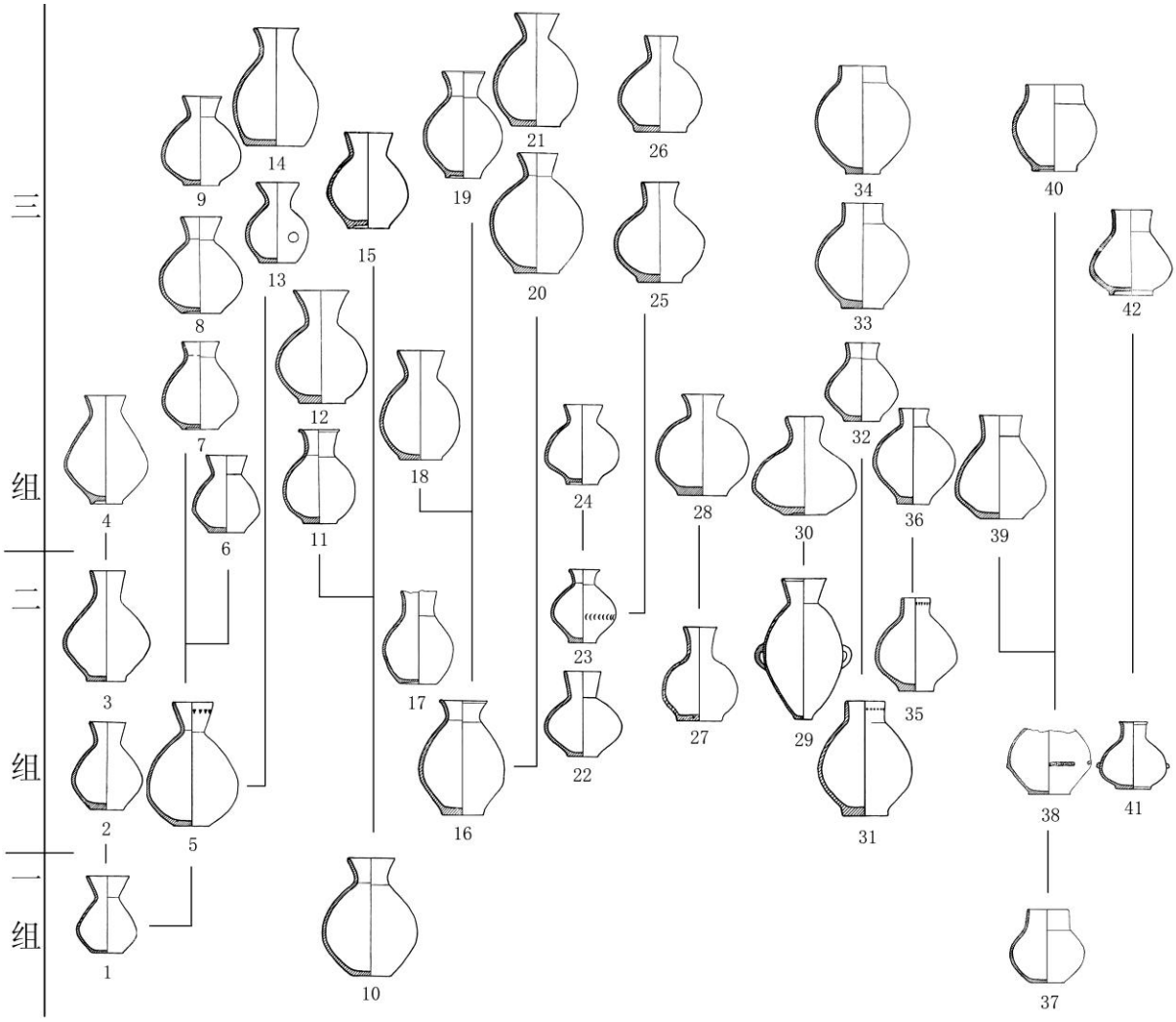
图二
山城子 C 洞墓葬
出土陶器

1. M1：9　　2. M1：10
3. M1：8　　4. M2：2
5. M2：3　　6. M8：1
7. M5：4　　8. M5：2
9. M11：8　　10. M11：1
11. M11：9　　12. M11：3
13. M7：4　　14. M7：5
15. M7：2　　16. M7：6
17. M7：1



图三
山城子 B 洞墓葬
出土陶器

1. T2②：22　　2. T2②：34
3. T2②：61　　4. T2②：38
5. T2②：63　　6. T2③：20
7. T2③：40　　8. T2③：43
9. T2③：33　　10. T2③：65
11. M5：9　　12. M11：7
13. M11：1　　14. M5：6
15. M11：5　　16. M11：6
17. M11：1　　18. M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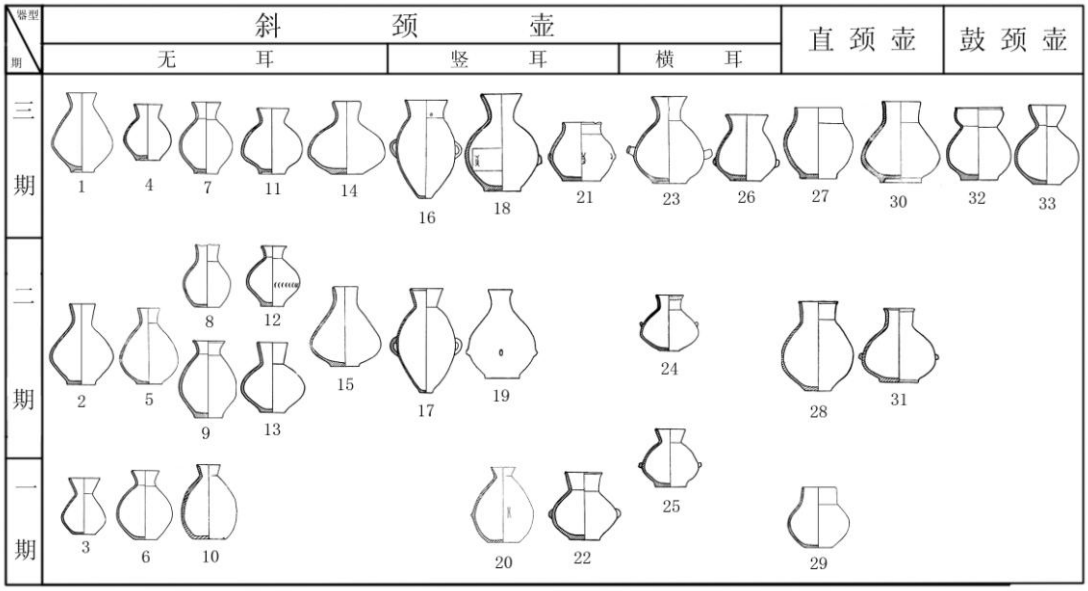


图四　张家堡 A 洞、山城子 B、C 洞出土斜颈壶、直颈壶的排序示意图

斜颈壶：1. III1（M45：1）　2. III2（M38：1）　3. II1（M37：1）　4. III4（M20：8）　5. I（M41：5）　6. III3（M30：3）　7. IV（M20：21）　8. VIII1（M6：8）　9. VIII2（M42：5）　10. VII6（M46：5）　11. VII6（M20：7）　12. VI1（M20：17）　13. VI2（M9：9）　14. VII3（M2：9）　15. III5（M36：1）　16. VII1（M24：4）　17. M7：4　18. VII2（M20：5）　19. VII5（M7：10）　20. VII6（M10：3）　21. VII4（M2：12）　22. II3（M28：3）　23. II2（M27：3）　24. V1（M36：3）　25. VIII4（M6：9）　26. VII3（M9：6）　27. VIII5（M2：11）　28. VIII6（M42：6）　29. IX（M28：6）　30. V2（M30：10）

直颈壶：31. M45：7　32. M3：2　33. M4：1　34. M2：15　35. M44：3　36. M35：1　37. M5：9　38. T2③：20　39. M29：3　40. T2②：22　41. M28：1　42. M7：8

（17. 山城子 C 洞，37、38、40、42. 山城子 B 洞，余为张家堡 A 洞，“｜”表示传承或演变，“└”或“┘”表示延用）



图五：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陶器分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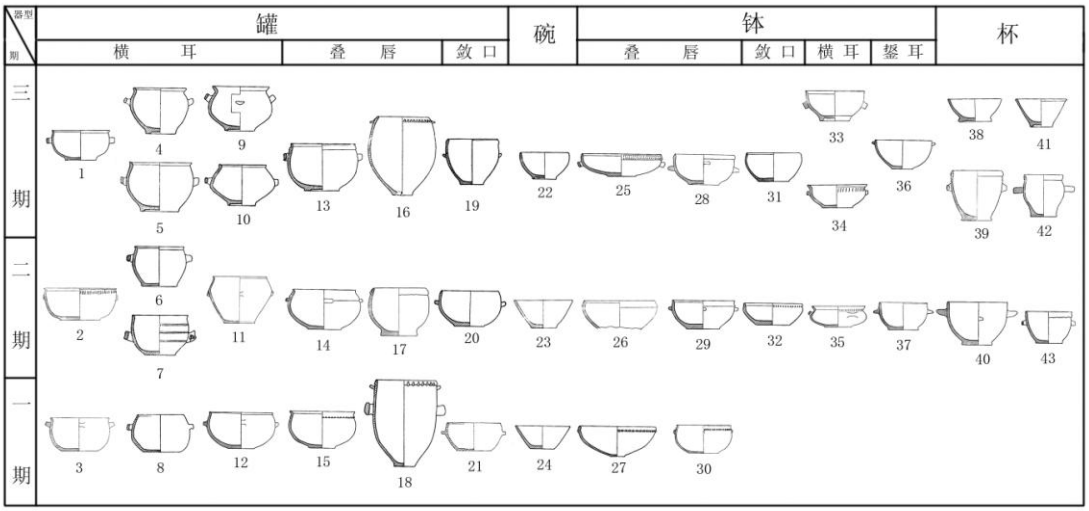
1. M20：8　2. M37：1　3. M45：1　4. M36：1　5. M1：1　6. M46：5　7. M7：10　8. M7：4　9. M24：4　10.M1：1

11.M36：3　12.M27：3　13.M28：3　14.M30：10　15.M22：3　16.M25：1　17.M28：6　18.M2：5　19.M10：7　20.M3：3

21. M3：1　22. M50：3　23. M8：4　24. M25：5　25. M45：11　26. M33：3　27. T2②：22　28. M13：9　29. M5：9　30. M7：8

31. M28：1　32. M34：12　33. M9：4　（1~4、6.、7、9、11~14、16~18、22~26、31~33. 张家堡 A 洞，5、15、19. 马城子 C 洞，8. 山城子 C 洞，10、20. 老城，

21、27. 山城子 B 洞，28~30. 马城子 B 洞）



图五（续）：马城子诸洞穴墓葬遗存陶器分期示意图

1. M9：5　2. M9：2　3. M11：5　4. M6：3　5. M6：13　6. M20：18　7. M45：6　8. M3：1　9. M6：4　10. M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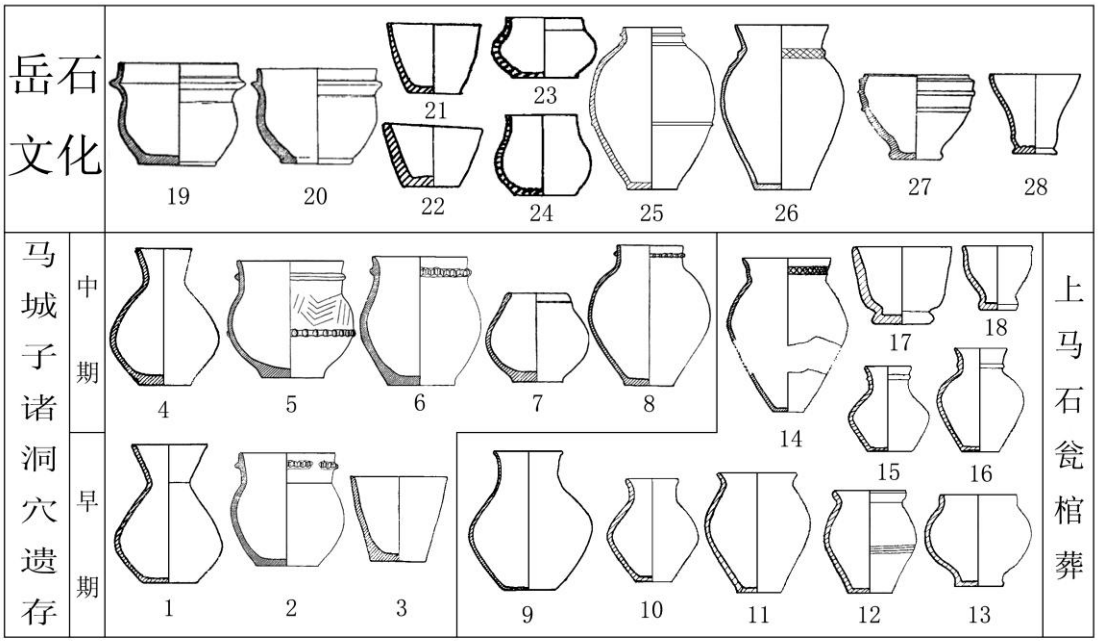
11. M11：9　12. M46：2　13. M5：1　14. M28：4　15. M46：4.　16. M36:17　17. M8：1　18. M50：1　19. M4：2　20. M28：2

21. M1：4　22. M34：9　23. M41：6　24. M52：3　25. M33：4　26. M25：2　27. M45：8　28. M3：1　29. M30：9　30. M7：6

31. M30:12　32. M41：2　33. M7：21　34. M36：5　35. M24：2　36. M25：4　37. M23：7　38. M16：3　39. M9：7　40. M28：5

41. M30：4　42. M6：6　43. M27：4　（1、4~7、9、10、12~16、18~20、22~25、27~29、31、32、34~36、38~43. 张家堡 A 洞，2、3. 山城子 B 洞，8、21. 老城，

11、30. 山城子 C 洞，17、26、33. 马城子 C 洞，37. 马城子 A 洞）



图六　岳石文化与辽东丘陵地区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关系示意图

1. M45：1　2. M11：1　3. M11：6　4. M38：1　5. M13：8　6. T2③：33
7. M41：4　8. M47：4　9. 瓮 M13：1　10. 瓮 M15：1　11. 瓮 M9：1　12. 瓮 M1：1
13. 瓮 M11：1　14. 瓮 M14　15. 瓮 M12：1　16. 瓮 M16：1　17. 瓮 M17：1　18. 瓮 M17：2
19. H11：67　20. T10③：9　21. T267⑦：41　22. T289⑦：16　23. T6⑪：16　24. H9：20
25. T152⑦：31　26. T215⑦：17　27. H9：20　28. T6⑨：18

（1、4、7、8. 张家堡 A 洞，2、3. 山城子 B 洞，5. 马城子 B 洞，6. 山城子 B 洞，9~18. 长海上马石，19、20、24. 牟平照格庄，21、22、25、26. 泗水尹家城，23、28. 烟台芝水，27. 青州郝家庄）